

#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向桃初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早期文明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下游洑水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以其无论在造型设计的奇巧、装饰风格的华丽,还是铸造工艺的精湛和体型的硕大气派诸方面均较商周王朝腹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丝毫不逊色,让无数学人赞叹不已。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湖南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明的发展水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中比较精美的或比较抢眼的作品按照中原地区铜器断代标准来说,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晚期,尽管大家对这批铜器的文化背景几乎毫无所知,学术界对于其主体的来源和性质有“本地铸造”和“南下的商人带来”两种不同的猜测,但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和新干大洋洲遗存商代铜器群的发现,南方地区的青铜文明再次令学术界刮目相看,在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的学术气氛中,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地位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唱鸣。这种背景下,湘江流域商代也存在同样的青铜文明的想法怎么说都顺理成章。

但是,学术界对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文化性质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王恩田先生早在80年代末曾经提出“湖南的甲组铜器(包含目前学术界认为的除大铙以外的所有商代铜器)就是部分商遗民被迫转移从北方带来的”,“时间似应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时期”<sup>①</sup>。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虽然也同意湖南多见的大铜铙等为商代晚期在本地铸造而认为湖南本土商后期“很可能有一较发达的青铜铸造中心”,但他同时也强调:“目前在根据这些青铜器来说明湖南这一区域在商代后期青铜文化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时似需谨慎”<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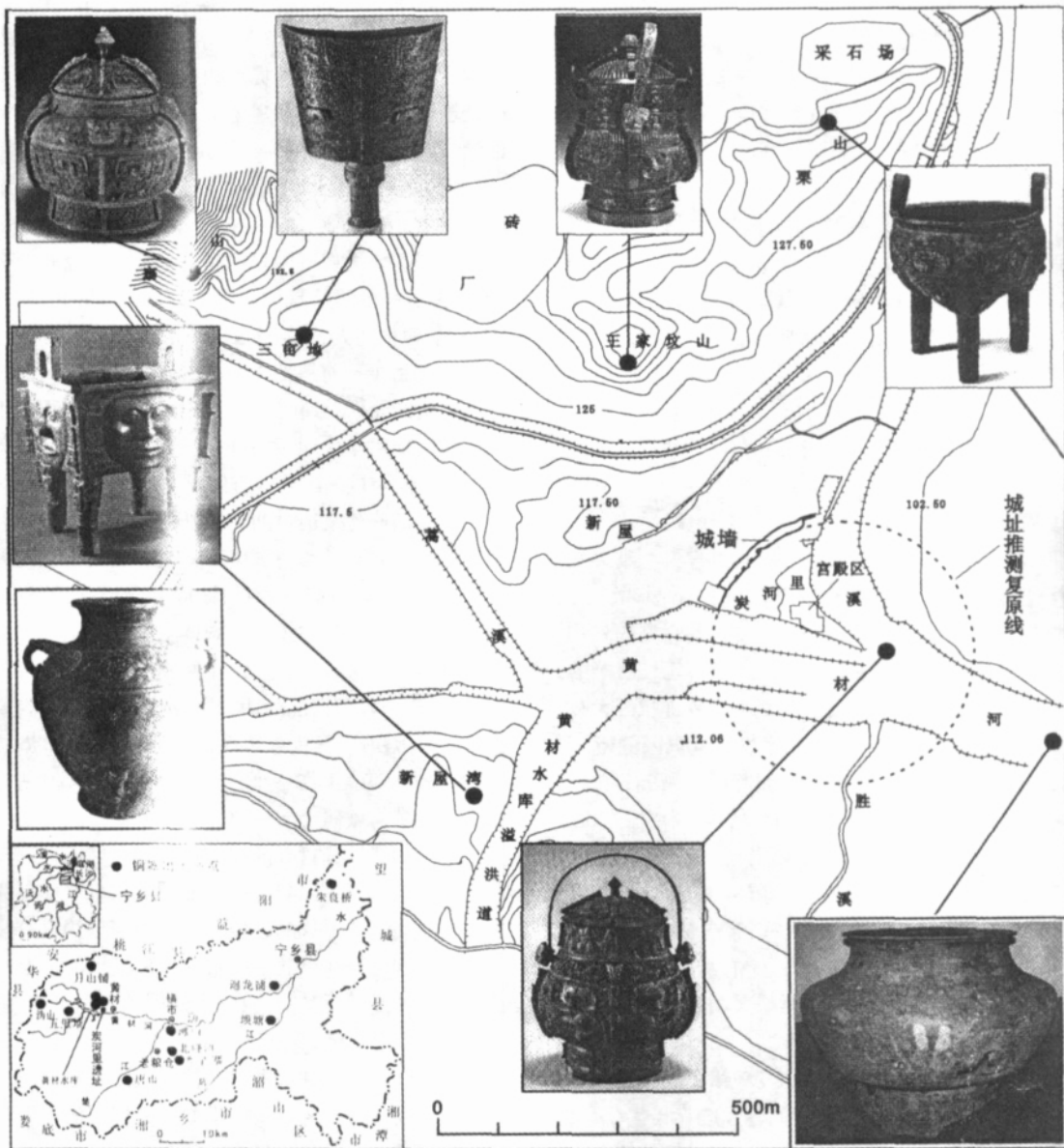
笔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湘江流域

的商周铜器发生兴趣,并着手从考古学文化背景方面开展工作,因为我相信这样才是解决湖南商周铜器性质问题的根本途径。铜器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或因素,必定依托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属的人群,如果铜器的文化背景不清楚或不能确定,则其历史价值会大打折扣。当然,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价值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古玩,因为它们中多数有具体的出土地点,有的还有其它伴出物或相关材料。随着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逐渐深入,加上对湘江流域商周铜器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的考察,笔者在王恩田先生认识的基础上于90年代末逐步提出了湘江流域的商周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包括江汉地区土著居民(可能是‘三苗’的后裔)为周人所迫逃难南下带来和来当地后铸造的”“从规模上来说后者甚至可能是主体”“湖南地区有商一代可能并不存在象吴城和广汉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sup>③</sup>的看法。

以上是截止近年学术界对于湖南湘江流域商周青铜器和商周时期青铜文明问题的几种解释,如果没有最近在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上述各种观点孰是孰非会因为无法得到证实而长期争讼下去,而且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笔者等的解释似乎最不容易让人接受。炭河里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这无疑是湖南湘江流域商周青铜器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必将推动湖南地区商周时期古代文化和青铜文明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二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宁乡炭河里遗址<sup>④</sup>最近的重大考古发现:



图一 炭河里遗址地理位置及宁乡境内出土商周铜器地点分布图

炭河里遗址位于湘江下游支流——沅水上游的黄材盆地,隶属宁乡县黄材镇寨子村。黄材盆地地处雪峰山脉东北麓,是沅水上源一个较小的山间盆地,面积近 1000 万平方米,三面环山,平均海拔高度约 100 米,沅水主源黄材河自西向东从盆地中间流过,炭河里遗址即座落在盆地西部的黄材河北岸。炭河里遗址发现于 1963 年,当年在遗址东南部黄材河与其支流墩溪河的交汇处大水冲出一件商代提梁卣,高至喜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发现了该遗址<sup>⑤</sup>。1973 年,湖南省博物馆又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从而基本认定了遗址的年代为商周时期(图一)。

大家知道,宁乡黄材是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器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按理说,炭河里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其大致年代的确定已经暗示该遗址可能并非一个普通聚落,而很可能是与周围及附近地区大量出土的商周铜器群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遗憾的是,因为各方面原因,炭河里遗址在其被发现以后的三十年内一直未引起考古部门的足够重视。

1994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黄材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再次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重点勘探,确认炭河里遗址是该区域内目前所见最理想的遗址,它的发掘应该会对宁乡商周铜器群的研究

有突破性意义。2001年春,我们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此次发掘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发现了可能是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要线索。2003年冬至2005年春,我们接连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共3000平方米,果然取得了惊人但又是意料之中的重大收获。

根据2001年发现的线索,2003年发掘伊始,我们首先就在遗址现存区的东南部近现代地层下发现两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分别编号为F1、F2),并于两座台基上各清理出一座可能有回廊的大型木结构建筑遗迹,其规模宏大(面积各约800平方米)、规格较高(柱坑直径大者超过1米),且呈东西向南北排列,推测应属同时期的两座宫殿性质的建筑。于是,我们对遗址西北部现存长度200多米、宽12~15米、高出地面1~2米,当地村民传为民国时期公路的土堤进行了试探性解剖发掘,结果证明该土堤确为商周时期人工所建,可能就是城墙。通过随后大量探沟的发掘考查,初步探明在城内外均有大型壕沟,其中城外1条、城内2条,均与城墙的走向一致。炭河里遗址现存范围和主要堆积区大致集中在黄材河与其支流坝溪及城墙所包围的范围内,面积2万余平方米,而按照城墙所呈弧形的弧度进行圆形复原,城内面积应在15万平方米左右。因此,我们推测遗址附近的两条河流历史上肯定经历了改道或位移,商周时期这两条河的位置应该在城外,因为遗址所处盆地地势较低,容易被山洪危害,应该不会利用河流进行防御,一定有封闭的围墙,而且防御水患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修筑城墙的主要目的之一。

城墙、壕沟和宫殿建筑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城的始建和废弃年代、城内为何有两条壕沟、它们有何功能、与城墙是什么关系、城址附近河流的变迁情况如何、墓葬区在哪里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取得了下列成果:

1. 通过在遗址南面黄材河对岸进行的地貌考察和探沟发掘工作,找到了两条古旧河岸的痕迹。其中,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50米处的河堤痕迹很明显,经访问得知为1969年大水之前的黄材河南岸河堤。而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150米处隐约可见一古河岸痕迹,经钻探和发掘了解到,该处以南的地层堆积在耕土层下有商周时期文化层,而该处以北范围内均为2米以上的淤土和砂砾层,是典型的河相堆积,这似可证明黄材河商周以后大约向北移

动了百数十米,从而冲毁了城墙和城址。遗址东面坝溪河的目前状况是1953年在洪水冲刷的基础上人工改道形成的,其老河堤现在遗址东北面200余米处清晰可见。看来炭河里遗址及城墙目前保存状况的形成的确与黄材河及坝溪的改道有直接关系。

2. 壕沟的多处解剖和清理发现,城内的2条壕沟虽均宽15米、深2.5米左右,但沟内堆积情况却完全不同。北边靠近城墙的壕沟(编号G6)底部有较厚的灰色淤泥层,且包含物很少,沟上部的晚期堆积较厚,而南边距离宫殿区较近的壕沟(编号G5)底部淤泥很少,有厚约1.5米左右的灰土堆积层并含有密集的商周时期陶片。这说明G5废弃堆积的年代与城的使用年代同时,其形成年代当早于城墙,其废弃很可能与城墙的建造有因果关系。我们推测G5是现存城墙修建之前炭河里遗址的外围环壕,后因遗址扩大并修筑城墙而被废弃并沦为城内生活垃圾的倾倒所,而G6的形成应与城墙有直接关系,从沟两侧自然土质和沟的体积与城墙主体部分土质和土方量基本一致来看,它应该是修建城墙时取土形成的,而且沟内堆积情况表明,其形成后应一直作为城内排水设施使用,其废弃年代也应与城墙相同。城外壕沟(编号G9)仅在一处进行了解剖发掘,但钻探结果表明其与城墙走向一致,沟内堆积为淤泥夹河卵石,沟两侧被其打破的次生黄土层与城墙基础部分堆积的土质土色无异。由此证明炭河里城墙是两边取土中间筑墙形成的,城内外两条壕沟均具有排水功能。这与长江以北地区目前所见城址的情况相比有显著特点,却很适合黄材盆地周围山高水急、来去迅速的水文环境。另外,G5出土了大量陶器,目前已修复200余件,这批陶器不仅是判定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也是对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性质研究的关键材料。

3. 宫殿区因为不便轻易处理已揭露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即F1、F2),我们仅选择在两座基址之间较小范围内继续进行发掘,同时对两座基址进行了解剖。结果表明,在这两座基址下面还有三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可依地层本身将炭河里遗址宫殿区现存堆积划分为从早到晚的四个时期,除第1期可能为普通居民生活区外,第2~4期均为宫殿建筑分布区。据此,我们推测第2~4期与城的使用年代大致相始终,但不排除可能有晚于第4期的堆积被破坏和冲毁。第1期的年代可能略早于城墙而与居址区外围环壕G5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同时。

4. 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组织专门队伍在城址



周围台地和低山进行了近半年的钻探调查,特别是以往出土过铜器的地点附近。但始终未发现可能与城址相关的主要墓葬区,仅在城址西北部“新屋组”台地上找到十数个零星分布的小型墓葬,其中有西周墓<sup>⑦</sup>7、春秋墓2、战国墓3座。可喜的是7座西周墓虽然规格较小,但均出土铜器和玉器,我们判定其墓主人身份应为中下层贵族。这批墓葬的发现和清理,对于建立炭河里城址与以往出土铜器群之间的联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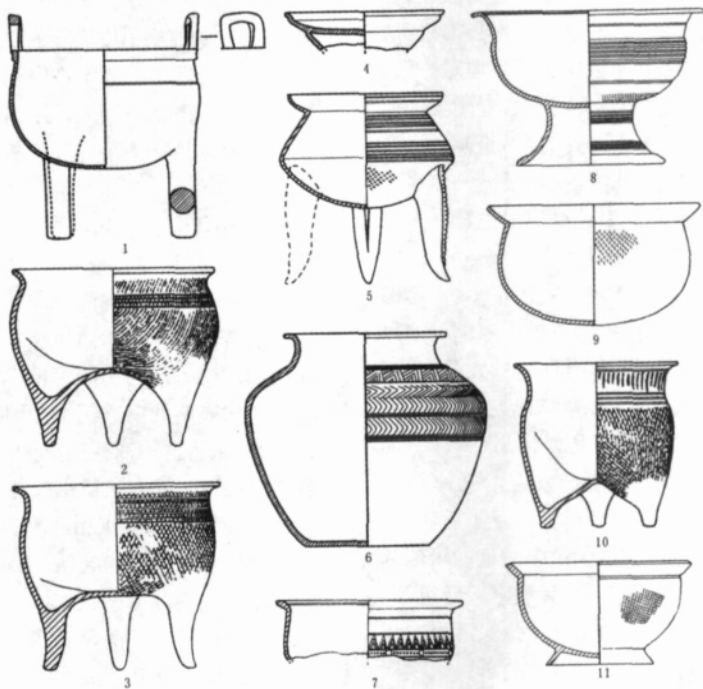
### 三

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和性质等问题,发掘简报和拙著《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研究》<sup>⑦</sup>一文主要根据G5出土陶器(图二)中外来因素器类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同类器的比较,再参之城址各重要遗迹出土遗物以及各遗迹之间的早晚逻辑关系,初步认定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前后。从陶器分析来看,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体,同时包含可能来源于

化一致的城址或宫殿基址均非正南北向而略偏东的特点以及墓葬中随葬玉器的作风等,又似乎表明以中原商周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传统不仅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尤其在礼制方面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认为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一支外来势力与本地文化融合并存的地方青铜文化,可以命名为“炭河里文化”。炭河里城址面积较大,城内外均有壕沟;城内几个时期的宫殿基址规模宏大、作工讲究,规格应很高;城内文化堆积层中发现较多的小件铜器、铜器残片和铜块等,城外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多数铜器地方特点明显,无疑为当地铸造,推测城内应该有铸铜作坊;而且,城址周围及附近地区历年来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和炭河里城址有密切关系。因此,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主要存在于西周时期但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湘江下游地区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聚落或都邑。

与炭河里遗址面貌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分布于黄材盆地(调查材料显示城址周围台地上零星分布的同类遗址点另有数处,其中出土人面方鼎的

胜溪村新屋湾一地点2001年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发现残存的壕沟一段,并出土大量西周时期陶片)外,目前所见还有位于沅水入湘江河口处的望城县高砂脊遗址。高砂脊遗址1996、199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sup>⑧</sup>,遗址居址区遭严重破坏,仅发现一批墓葬。其中2座墓主要随葬铜器,墓底形状为长方形并有棺类葬具痕迹,其余17座墓形状不甚规则,坑内



图二 炭河里城址出土陶器举例

- 1.A1式鼎(05G5⑥:36) 2.B型鬲(05G5⑦:46) 3.C型鬲(05G5⑥:46) 4.假腹豆(05G5⑥:98) 5.Ba I式鼎(05G5⑦:36) 6.A型瓮(05G5⑥:85) 7.8.B型簋(05G5⑥:104、(05G5⑤:3) 9.A型盆(05G5⑥:75) 10.A型鬲(05G5⑥:38) 11.A型簋(05G5⑦:6)

湖北东南部、洞庭湖西北部 and 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特征性因素,表明它是一支地方性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外来文化尤其是商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分量,器类有高、簋、假腹豆等,周文化因素如鬲、簋等也有少量出土,特别是大量出土的仿铜陶鼎形制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至西周时期的铜鼎几乎完全一致。再加上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及其与中原地区商文

陶器多有意打碎后分层放置,与岳阳温家山<sup>⑧</sup>商代晚期墓葬埋葬习俗相同,应是没有棺类葬具的贫民墓葬。比较炭河里和高砂脊两处遗存,有如下诸多共同点,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1. 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属性相同。如: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呈红褐色,均有少量红胎黑皮陶和硬陶,纹饰均以方格纹为主,器形多为圜底、三足和圈足器,平底器较少。器类组合和文化属性均主要包含本地土著因素和以商周文化为代表的外来因素两大类,其中本地因素的器类如宽折沿的金和釜形鼎、高领罐、钵、碗、器盖和硬陶罐、釜等均为两地大宗器类,外来因素器类如仿铜陶鼎、鬲、簋、盆、盂、尊等两地均见。2. 铜器的种类和文化属性接近。如均以鼎为主,此外如尊、矛、削、斧、刮刀、车马形器等两地均见。从文化属性来看,均分为商式、融合式和土著式三组,特别是土著式器类如宽折沿形鼎、斧、刮刀、车马形器等形制完全相同。3. 两地墓葬的埋藏习俗类似。炭河里发现的7座小型中下层贵族墓,开口保存较好的2座上为椭圆形,与高砂脊5号墓相同;基底均为长方形,其中2座有棺类葬具痕迹,与高砂脊2座铜器墓一致;炭河里没有发现贫民墓,无法比较,但两地墓葬流行用陶器或铜器残片随葬且随意摆放的现象惊人地相似。4. 遗存年代和所处地域一致。高砂脊遗存的年代从发表的墓葬材料来看主要为西周早中期,与炭河里城址年代一致。地域上高砂脊在洑水入湘江口,炭河里在洑水上游,均处同一水系的干流两岸,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可浮舟三日一个来回,何其便利。当然,炭河里与高砂脊也有一些差别,如:高砂脊陶器中商文化因素不及炭河里多、也不够典型,其仿铜陶鼎不象炭河里是典型中原铜鼎的风格,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早期越式鼎,也不见炭河里较多见的殷式簋;高砂脊陶器无论质地、大小规格、火候、作工等方面均不如炭河里;高砂脊的两座铜器墓形制远大于炭河里已发掘的几座西周墓,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至少不亚于后者,但均不见玉器等。不过,我们认为这是遗址的聚落等级不同造成的。炭河里遗址有城、大型宫殿建筑等,毫无疑问是本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是炭河里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而高砂脊很可能是隶属于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或方国的次级聚落,故而其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而可能是高砂脊当地最高统治者的两座铜器墓虽然随葬铜器较多却没有资格随葬玉器,表明其地位尚不及炭河里的中下层贵族。高砂脊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炭河里文化这一点的确

认,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炭河里文化的分布范围应是以洑水流域为主要区域并有可能包括北到资水下游南岸的今益阳、桃江、安化,南到湘江及其支流涟水流域的今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的湘江下游西部地区。

炭河里城址、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城址年代、文化性质等的初步认定,为我们探讨遗址与周围地区以往出土的商周铜器群之间的联系,确认宁乡铜器群的文化背景,进而对整个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起源、发展等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及线索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我们认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关系密切,同为炭河里文化的不同内涵,即城址与铜器群的主人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人群。理由是:

1. 地理位置重合。城址位于黄材盆地西部,而铜器群出土地点正好以城址周围分布最密集。以往出土的许多重要铜器大多数就分布在城址周围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据统计已达250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𠄎”人面纹方鼎、“戈”卣、“癸”卣、“己”分裆鼎、云纹饅、兽面纹饅、“父乙”涡纹盂等。另外,出土虎食人卣的洑水和出土四羊方尊、象纹大饅的月山铺<sup>⑨</sup>分别位于黄材河及溪河上游山区,曾经出土数十件铜饅的老粮仓地区与黄材盆地也仅一山之隔,最远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这些铜器无疑是基于某种方式从黄材盆地内流散过去的。

2. 年代吻合。如前所述,炭河里城址的主要存在时期为西周时期,遗址的最早年代可能到商末。铜器群的年代,虽然按照中原地区的断代标准来看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为商代晚期,但也有明显为商末周初和西周时期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现在断为商代晚期的铜器铸造于西周时期的可能性。况且,即使是铸造于商代晚期的铜器,其在西周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被使用或埋藏均合乎情理。

3. 文化等级上正相匹配。炭河里城址的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显示其决非普通聚落,而是一定范围内区域文化的中心都邑,青铜器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必定为某一政治集团或国家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和支配。所以,炭河里城址和周围出土的铜器群应该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权力阶层。

4. 城址内出土的铜器、玉器等遗物显示其与周围地区出土的铜器群有直接联系。如:前述1963年黄材河与坵溪河交汇处发现的“癸”卣(注⑤),

器表纹饰无任何磨损,内贮玉器未曾散落,可断定不曾发生长距离位移。其出土处大致位于城址中心区,可证该器原本是城内容藏或祭祀所埋之物。该器铭文的“𠄎”字也见于城外出土的分裆鼎和涡纹鬲上。器内所贮 1170 余件玉器,绝大多数为管、珠类,还有少量玦、环等,与城外出土的“戈”𠄎中所贮玉器种类一致,玉质和工艺也相同。2001 年夏在城址东面 1.5 公里处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兽面纹甗<sup>⑩</sup>,肩部四个牺首已不见,口沿和圈足有残损、器表纹饰有明显消磨痕迹,应该是埋藏于城内之物被河水冲下去的。2005 年城内壕沟 G5⑥层出土的 1 件小铜斧,形制与 1959 年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甗(注⑩)中所贮 224 件小铜斧完全一致。

5. 城外墓葬的年代与城址及铜器群相同,分布地点也在共同的小区域内,墓葬出土遗物分别与城址和以往出土的铜器群有诸多联系,证明三者是一体的,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内涵。如:墓葬周围台地及填土中多见与城内面貌一致的陶片。墓葬出土的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的器类,也有地方特点作品,主要有鼎、𠄎、爵、尊、刮刀等,除不见铙外,其它与铜器群种类基本一致。玉器亦以管、珠为主,见少量玦、环等,种类和工艺都与“癸𠄎”𠄎、“戈”𠄎中所藏玉器相同。

也许有人会认为,宁乡铜器群中有一批铜器的年代为商代,而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为西周,年代上似乎不太吻合。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成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反证。大家知道,铜器为耐用品,商代铜器在西周乃至更晚的时期被使用和埋藏不难理解,在考古发现中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况且,宁乡出土的铜器中也有一些明显属于商末周初或西周前期的,如人面方鼎即有学者断为商末<sup>⑪</sup>，“癸父乙”涡纹鬲和 2002 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月山铺乡龙泉村收集的铜盃<sup>⑫</sup>等年代很明显属于西周时期。另外铜器本身的断代也不能绝对化,即使在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器很多时候也无法绝对区分,南方地区铸造的铜器更是如此,某些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到目前为止,湘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铜器材料尚无一例可确证埋藏年代为商代者。城址和青铜器均属高等次的文化内涵或因素,对于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来说更是不可多见,而这两种因素同时在地理位置偏僻而非交通要道的宁乡黄材地区交集,单从概率上来说,两者之间也应该存在密切关系。

#### 四

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的同属关系,确定了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性质等问题及湘江流域青铜文明发展历程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湘江下游宁乡一带存在一个拥有比较发达青铜文明的文化或政治中心这一点早已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其主要依据是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以商代晚期为主)的青铜重器,炭河里城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推断,而且进一步将具体地点锁定在洑水上游的黄材盆地。然而,让大家想不到的是,拥有这批青铜器的文化或文明在该地区的生存时代是西周时期而非商代,如果你相信炭河里城址与其周围出土的铜器群相关并认为发掘者对城内出土陶器年代判断无误的话,那么这应该就是事实了。如此一来,我们怎样解释这里出土的铜器有相当一部分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而且文化面貌明显属于商文化?更重要的,如果以洑水上游出土铜器为代表的湘江流域商代铜器可能与本地区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并无关系,那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状况岂不要重新认识?

目前,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总数已达 400 件以上,过去的研究一般以文化属性为标准将它们分为“中原型”、“地方型”和“混合型”三类<sup>⑬</sup>,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混合型”、凡非“中原型”者应均为“地方型”<sup>⑭</sup>。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本文不采用这几个概念,而是根据铜器本身造型和装饰风格等方面的特征,结合相同特征的地域分布情况对铜器群进行分组处理,对于学术界存在争议或属性不明者暂时单列成组,以备进一步讨论。这样,我们可以将湘江流域商周铜器大致分为以下五组,即:

A 组:形制和纹饰风格完全同于中原地区同类器者(器类有鼎、鬲、尊、觚、爵、盃、簋、鬲、甗、提梁甗等),有铭文的铜器应归入此组。以往论者均将本组铜器划归“中原型”,并认为是中原地区的产品。

B 组:主要包括大口长颈尊(如华容尊、岳阳费家河尊<sup>⑮</sup>等)、折肩深腹鬲(有学者称为“截头尊”<sup>⑯</sup>,标本有岳阳鲂鱼山<sup>⑰</sup>和平江浯口镇<sup>⑱</sup>出土的 2 件)和甗(标本有新邵陈家坊甗<sup>⑲</sup>和 2001 年炭河里城址下游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型甗 2 件)等。

C 组:各种动物造型的尊和𠄎,如:四羊尊、双羊尊<sup>⑳</sup>、象尊、牛尊(以称“牛觥”为确)<sup>㉑</sup>、豕尊<sup>㉒</sup>、虎食人𠄎、鸛𠄎等。



D组:大铜铙。因其文化属性存在争议,故单列为一组。

E组:基本肯定为湘江流域本地铸造的铜器。除越式鼎、钟、钲、刮刀、斧等数量较多者外,还有如桃江出土的马簠<sup>⑤</sup>、湘阴出土的龙耳簋、衡山霞流的桑蚕纹尊、岳阳、湘潭、衡阳等地出土的蛇纹垂腹卤、湖南省博物馆收集的四系簋、虎纹钲<sup>⑥</sup>等。

这五组铜器中产地或文化属性能够确定的为A组和E组,其余三组学术界意见不一,需要进行讨论。

B组铜器,以前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归入“中原型”,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而认识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维吉利亚·凯恩<sup>⑦</sup>、罗伯特·贝格立<sup>⑧</sup>和日本学者林已奈夫<sup>⑨</sup>等已经认识到这类铜器与殷墟出土的铜器铸造年代可能相同但风格迥异,应该是长江流域(即南方)当地铸造的作品,虽然在某些纹饰方面受到了殷墟铜器的影响,但器形、装饰风格和铸造技术上主要继承了二里岗期铜器的传统。因此,贝格立将其定性为“南方青铜器”,林已奈夫将其归入“地方类型”青铜器。最近,日本学者难波纯子将这组铜器定名为“华中型青铜器”,认为它们是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制品<sup>⑩</sup>。这些成果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接受,但对于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讨论来说尚嫌不足,因为它们到底是湖北还是湖南铸造对于湘江流域商周铜器性质和来源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现有材料表明,本组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范围,北到湖北枣阳<sup>⑪</sup>、安陆<sup>⑫</sup>,南到江西南昌<sup>⑬</sup>、湖南新邵<sup>⑭</sup>,西到湖北江陵<sup>⑮</sup>、沙市<sup>⑯</sup>、重庆巫山<sup>⑰</sup>、四川广汉<sup>⑱</sup>,东到安徽阜南<sup>⑲</sup>、六安<sup>⑳</sup>、江苏江宁<sup>㉑</sup>。由于铜器铸造技术非常复杂,不可轻易学会和掌握,而且往往为一定区域内统治集团所垄断,对外具有保密性,因此,以上各地点出土的风格相同的铜器决不可能是各自就地铸造的,而只可能铸造于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区域文化的中心地区,即使如此,其器形、纹饰等方面的共有传统逻辑上讲应首先在某一个地区起源。本组铜器分布范围如此之广,此范围既不是同一个地理区域更不是同一个文化区域,那么,这批铜器流动的方式、过程、时间和原因等是我们对其产地进行研究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本组铜器的起源或铸造地最大可能是湖北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理由是:1. 江汉平原东部处于上述出土地点分布范围的中心区,此类铜器由这里向周围地区扩散顺理成章。我们现在看到的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重要因素(尤其

是外来因素)无一不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中介向东、西、南诸方向传播。舍此而外,无论认为它们的产地为四川、湖南或安徽,都与当时其它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相矛盾。2. 江汉平原东部地区二里岗时期是商文化在南方的直接控制区,这里铸造了大量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早商铜器,也是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可以想象,在商代晚期商人退出该地之后,这里无论从地理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青铜冶铸技术基础和铜矿资源等方面来说,都最有可能成为本地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应该存在至少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况且正如贝格立、难波纯子所说,本组铜器无论造型风格还是铸造技术都更多地继承了二里岗期铜器的传统。因此,它们产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的可能性大于其它任何地区。

C组铜器以动物造型为特征,由于到目前为止中原地区出土铜器中动物造型的确实较少,而湘江流域所见该类铜器比较多且动物的种类齐全,有象、虎、牛、羊、豕等,故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产于湖南,而且,此组铜器的装饰风格和纹饰特点与殷墟铜器有较多的共同点,故一般认为其铸造年代为商代晚期。我想,如果不结合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古代文化的背景单从铜器本身而言,上述结论似乎合理。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本组铜器应铸造于中原地区,只是中原地区尚待发现<sup>㉒</sup>。本文不敢肯定这类铜器到底产于何地,但对其商代晚期铸造于湘江流域的观点有几点不同的思考:一是从地域分布来看,动物形象在铜器上出现的情况并非湖南一地独有。邻近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存也见单体的虎、鼎耳上有卧虎、伏鸟、甗耳上有立鹿、鼎足有虎形、鱼形等<sup>㉓</sup>。殷墟铜器也见动物造型者,如妇好墓出土的鸂鶒尊、司母辛四足觥及SM539出土的鸂鶒尊<sup>㉔</sup>,关中地区西周铜器也有不少动物造型的,如宝鸡茹家庄象尊、鸟尊、獬尊等<sup>㉕</sup>。二是铸造年代的问题。如果这类铜器非中原地区铸造,那么完全按中原的标准来判断其铸造年代并不一定准确,有大量事实证明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周边地区确实保留了很长时间的。三是要结合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背景和本地青铜铸造技术传统的整个过程来考虑。如:湘江流域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是否与铸造这批铜器所依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匹配?如果本地商代晚期就有如此先进的铜器铸造技术,又怎么解释本地西周时期铸铜技术反而更加落后了呢?所以,只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相互契合而不矛盾的情况下上述结论才有说服力。

D组铜器大铜铙的相关问题,近年来讨论较多、进展也很大,至少大铜铙铸造于南方地区已不容置疑。关于大铜铙的起源、演变序列和年代问题,多数学者论证湖北阳新<sup>⑥</sup>、新干大洋洲等地出土的铙年代较早,而湖南多见的粗线兽面纹大铙应该是较晚的形制<sup>⑦</sup>,将原来高至喜先生编排的序列<sup>⑧</sup>颠倒了过来,对此笔者非常赞同。不过,关于阳新、新干等早期铜铙的年代,论者普遍根据新干大洋洲遗存断为殷墟二期,罗泰先生定的更早(二里岗期与殷墟期之间)<sup>⑨</sup>。笔者以为其中存在较大问题。首先大洋洲遗存的年代根据最近彭明瀚先生的研究<sup>⑩</sup>,应为吴城文化第四期(即吴城遗址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这一成果动摇了大洋洲铜铙殷墟前期说的根基。其次,从殷墟出土的小铙到新干等南方早期铙再到湖南的粗线兽面纹大铙,无论是在形体由小到大、铙腔由短阔渐成长方、甬部从无旋到有旋以及主体纹饰兽面纹的演变等各方面均呈现出比较严密的逻辑发展关系,这不仅表明南方大铙的起源与殷墟小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表明新干等南方早期铙的年代逻辑上晚于殷墟小铙。而殷墟小铙出土遗存的年代多为殷墟文化二、三期,则新干等早期大铙的年代当不早于殷墟三期,这与彭明瀚的研究结果相合。而在湖南常见的粗线兽面纹铙与新干等早期铙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形制的标本如安徽庐江铙<sup>⑪</sup>、江西宜丰铙<sup>⑫</sup>等。何介钧先生将南方的兽面纹铙分为四式<sup>⑬</sup>,其序列和演变规律的总结非常清楚可信,但年代判断上同样因受新干大洋洲遗存公认年代偏早的影响,将湖南出土最多的Ⅲ、Ⅳ式兽面纹铙的流行年代断为殷墟四期。本文认为,如果将新干、阳新等早期大铙的年代定为殷墟三期左右,则湘江流域最常见的粗线兽面纹大铙的年代就只能是商末至西周早期,这样一来它们与炭河里城址及炭河里文化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

以上五组铜器的文化属性和原产地看来至少有三种情况,即产于中原地区的商式铜器(A组)、铸造于本地的越式铜器(E组)和应该铸造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的所谓“华中型”铜器(B组)。D组铜器的铸地应该在湘江流域,但其源头在鄂东南赣西北地区,湘江流域的大铜铙多是晚出的型式。C组铜器的原产地可暂时存疑。以上五组铜器在地域分布上并无明显差别或规律性,而从铜器分布的密集程度、精美程度和铜器等级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看来,沅水上游的黄材一带无疑是其中心地区,在这里五组铜器均见。这说明至少在黄材地区上述五组铜器是

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即它们哪怕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曾经属于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或考古学文化。黄材地区西依雪峰山脉,地理位置偏僻,既非湘江流域腹心之地,也非交通枢纽。那么,这里集中出土的外来因素铜器只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较短的时期内集中地由一定规模的外来迁入者带来的,而不太可能是各自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自然流散所形成。而且,黄材地区似乎是外来铜器流入的终点站和驻足地,这里的地方类型铜器出土最多、年代也最早,这是外来铸铜技术和本地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及其与铜器群同属关系的确定,进一步证明黄材地区的商周铜器群与商周时期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相关联,绝不可能是零星地、自然地流散所形成。

那么,以黄材地区为中心的宁乡铜器群究竟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有关呢?让我们从其中的商式铜器谈起。首先,黄材出土的大量商式铜器和炭河里城址的年代表明在不早于殷墟至不晚于西周早期这段时期内有一支一定规模的商人集团来到了该地区。因为,黄材出土的商式铜器等级均较高,且不少有铭文,其中含“𠂔”字的就有三件,这些铭文属于中原文字系统,“𠂔”字已被论证是商人一支的族名或族徽,另外“戈”也是商族的主要支系,看来黄材的这批商式铜器应与“𠂔”、“戈”两支商人的上层有关,它们应铸造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对于商人来说具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特殊意义,自然不会赠与外族人,且一般置于庙堂之内,除非灭国,不可能在一般的战争中为外族所获,更不会交换或买卖,商人也不会因为普通的征战或贸易活动等将这些铜器带在身边。所以,成批的商式铜器来到黄材肯定与一定规模的商人集团迁徙到此有关。

中原商人集团会在什么背景之下来到黄材呢?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商人在商代晚期向南扩张到了这里;二是商人在商末周初即周灭商前后为周人所迫南迁至此;三是西周早期随周人南征进入湖南。但是,以下理由表明第一、三两种可能性不能成立。其一,黄材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根本不适合作为控制整个湘江流域的政治和军事重心之地。商代晚期商人向南扩展也好、西周早期周人南征也好,都不可能选择于黄材盆地设立其在本地的政治、军事据点,而应该选择湘江干流地区,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即使他们在湖南的行动失利,也不会选择西进黄材,而应北退。其二,炭河里城址的文化面貌在日用陶器方面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商周文化因素所占



分量都较少,如果这里是商文化或周文化主动南进时设立的据点或重镇,其文化面貌断不致如此。其三,现有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晚期江汉平原地区已不为商人所控制,势力最强盛的武丁时期也只能偶尔南征。所以,商代晚期商人根本没有可能扩张到湖南境内。湖南湘江下游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是以本地传统为主的地方性文化,虽然可见一些商文化因素,但却是商代早期二里岗商文化因素的遗留,与殷墟商文化关系并不密切。西周早期,周人曾经南征汉水流域,最后也仅在汉水以北地区分封了一些诸侯小国,“以屏周室”。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很明显属于地方土著文化(以阳新大路铺遗址为代表),周文化的影响很小,湘江流域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西周时期周人的势力根本没有越过长江,更何况进入湖南湘江流域?因此,商人也不可能是随周人南征进入湖南的。这样,只有第二种可能性即黄材地区的商式铜器是商末周初由南迁的殷遗民带来的了。在炭河里城址发现之前,笔者虽然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这一认识,完全是建立在对宁乡铜器群和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综合考察基础上的推测,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炭河里遗址发掘和研究成果显示,与宁乡铜器群相关的炭河里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使用至西周中晚期,城外贵族墓葬的年代也均为西周时期。这说明宁乡铜器群的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时期,其埋藏年代则可能为西周或者更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见任何埋藏年代早于西周的证据,这为“殷遗民南迁说”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有人曾私下提醒我:黄材出土的铜器大多都是商代的,这里会不会还有一个商代城呢?我回答说:不会!如果你认为这些商代铜器在黄材地区的使用年代一定是商代,那么你应该考虑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是不是可以早到商代而不应该怀疑城址与铜器群的同属关系。很明显,宁乡铜器群属于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炭河里、高砂脊两个重要遗址的发掘又表明炭河里文化的年代为西周时期,这一点如果被认同,那么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存在一个发达的铜器铸造中心或青铜文明中心的说法就完全靠不住了,无论它是本地土著文化的中心还是商人扩张南下建立的。黄材盆地地理位置偏僻、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是非常理想的避难之所,在这里建都的政治集团或方国,其总体国势毫无疑问义是处于守势的。不仅商代晚期商人扩张或周初周人南征进入湘江流域时不可能将其政治中心设在偏于一隅的黄材盆地,就算是商代晚期湘江流

域有一个能够铸造铜器的地方方国同样也不会在黄材建立其政治中心。而在商末周初殷遗民南逃进入湘江流域后,可能因为军事势力已不足以在湘江干流地区落脚,又不能北退的情况下,黄材盆地才有可能成为理想的苟安之地。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虽然在日用陶器方面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商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如宫殿建筑、墓葬葬玉和仿铜陶鼎等方面却显示出深受商文化礼制的影响。这种高度融合的文化面貌,正好可以诠释殷遗民进入黄材前后的政治处境以及炭河里考古学文化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构成中明显有一些可能来自于江汉平原、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的因素,如扉棱鼎足、假腹豆等,这些应该是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因素在当地商代晚期文化中的遗留,鼎足或鬲足刻槽的作风和大口长颈鬲等也是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最常见的特征。恰好,宁乡铜器群中也有很可能来自上述地区的制品,如前文所论B组铜器就应该产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而早期的南方大铎产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也是没有问题的。这说明在殷遗民南下的队伍中一定有一批原居于上述地区的地方力量。江汉平原东部孝感、黄陂等地考古材料分析表明,该地区西周早中期周文化面貌非常典型,多数学者同意将该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定性为周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sup>⑤</sup>。看来文献中周人早期在汉水流域多次用兵最后分封了“汉阳诸姬”的记载并非虚构。周人用兵汉水流域除了追击商人的残余势力外,封疆建国“以屏周室”和掠夺铜矿资源应该是其主要目的。如此,则江汉地方的豪族大家必定跟随殷遗民一起南逃,而且在人数上甚至可能超过殷遗民。至于在逃亡途中和到达黄材以后这一部分势力在炭河里城址所代表的政权组成中的地位,从目前材料来看,应该还是从属于殷遗民集团的。

以前学术界往往将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与新干大洋洲遗存和广汉三星堆铜器群进行参照,认为湘江下游地区商代晚期也存在同样发达的青铜文明。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下面的分析可证其谬:

1. 湖南铜器与新干、广汉铜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有相当比重的殷墟式铜器,后者则很少。如贝格立等认为新干铜器主要是继承了二里岗期的传统<sup>⑥</sup>,这与盘龙城类型商文化不无关系。三星堆的商式铜器(属本文B组)其实与殷墟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长江中游地区交流的结果,尽管它们可能是

在三星堆当地铸造的。

2. 湖南铜器中相当一批有铭文,除宁乡外,湘潭青山桥<sup>⑥</sup>出土的一批铜器也有“旅父甲”、“戈”、“𠄎”等铭文或族徽,还有桃源“皿天全”方鼎、石门“父乙”簋<sup>⑦</sup>、桃江盃、邵阳祭旗坡爵<sup>⑧</sup>等,这说明湖南商代铜器的精华部分不是本地铸造,其主人是商人而非本地人。就算本文C组铜器和大铜铙是湘江流域本地铸造的,我们也应该在弄清它们和同一地域出土的商式铜器的关系之后再就本地商代晚期青铜文明发展程度问题下结论。如果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是两码事,显然与宁乡地区铜器出土的情况不合。如果说有关系,那是什么关系呢?其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本文前面已经论证,宁乡出土的商式铜器的来源只有“商末周初殷遗民南下带来”这一种可能性,那么与此相关的C组铜器和大铜铙要么不是本地铸造,要么就是殷遗民南下后铸造,铸造年代则晚于商代。

3. 假设湖南出土的商式铜器来湖南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而本地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又不是商文化,则只有这批铜器是零星星星而非集中地流散而来的可能性存在。如果是这样,这种成品而非技术的流进恐怕对本地铜器铸造的发展起不了什么作用。再退一步假设,随着这些铜器南来,本地逐步掌握了先进的铸造技术,在商代晚期铸造了动物类铜器等作品,那为什么到了西周时期却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呢?湘江流域西周时期本文E组铜器铸造技术之落后是有目共睹的,大铜铙也是一样,与动物类铜器相比有天壤之别。从目前比较清楚的地处湘江门户的岳阳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来看,除了相当于殷墟一、二期间商文化消退本地文化兴起这一重大变化外,与本地出土商式铜器年代相合的整个商代晚期并未发生大的文化突变,而如果本文所主张的商末周初殷遗民南下的情况也不成立的话,那湖南商代晚期就存在的发达的青铜文明怎么会一下子倒退到如此地步?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并没有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动物类铜器同样不是本地铸造,也是随殷遗民南迁进入湖南的,当然其不一定铸造于中原,也有可能铸造于江汉平原或鄂东南地区。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虽然带来了精美的铜器,但他们来本地后,因为政治经济实力大不如以前,加上逃难途中技术人才流失等原因,铸造技术和用料等方面难免出现倒退,而假如南下的殷遗民集团很快被本地文化消灭或同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湖南商代铜器与西周铜器这种技术上

的巨大差别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4. 许多研究者发现,两湖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在文化面貌上共性较多,与新干和三星堆铜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这表明两湖地区的商代晚期铜器可能原产于一个青铜文明中心。但是如果单从目前铜器出土的地域情况而言,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中心在湖南而不在湖北,不过,本文认为这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比较湘江流域和湖北江汉平原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文化基础等,后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两湖地区古代文化基本上融为一体,而且其总的状况和趋势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不断向湖南辐射,湖南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原始文化无不受到江汉平原的强烈影响,并且在文化发展演变的节奏上也是同步的。进入商周时期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冲击,两湖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被打破,江汉平原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毫无疑问成为中原王朝南下的必占之地和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中转站,这一时期内两湖地区青铜文化面貌的一体性虽然受中原王朝政治意图左右而有所削弱,但江汉平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突出了。如果商代晚期两湖地区只有一个青铜文明中心的话,可以肯定其必在江汉平原,湘江流域充其量不过是其辐射范围。与赣江流域和四川盆地相比,湘江流域平原狭窄,资源相对匮乏,境内既无丰富的铜矿又无盐业资源,决不可能替代江汉平原成为长江中游的文明核心区。如果长江中游地区的铜器铸造中心在湖南,本文B组铜器为湖南铸造,我们将无法解释该组铜器流传到四川、安徽和鄂西北地区的现象。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总体趋势是中原商周文化不断地从北部进入江汉平原并以之为中介向东、西、南三面传播,就算B组铜器是湘江流域铸造的,也缺乏这种逆向流动的文化背景,因为铜器的流动与文化和人群的流动直接相关,况且湘江流域的商式铜器、大铜铙和其它许多因素已明确告诉我们当时本地区文化和人群的流动方向是从北往南的。如果一定要说湖南商代晚期有一个铜器铸造中心,那湖北江汉平原地区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同样或更大的中心,现在来看至少本文B组铜器应是那里的产品。这样一来,除典型商式铜器、本文B组铜器、西周时期的越式铜器外,铜铙也非湘江流域起源,本地的铜铙标本已被公认为是最晚的,而且年代很可能是西周时期,那就只剩下动物类铜器了。而动物类铜器装饰风格与殷墟铜器非常接近,江汉平原地区又基本不见此类铜器,也少见

殷墟式铜器，难道湘江流域是殷墟商文化在江南的飞地吗？所以，商代晚期湘江流域不太可能有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但为什么湘江流域又出土如此多的铜器呢？我们认为这与商末周初中原及江汉平原地区的重大历史文化背景即周人对汉水流域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假设几千年后在台北故宫一带发现了大量商周铜器，那时的考古学家会不会认为台湾也存在一个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心呢？

以上从各个角度的反复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的主体不是本地铸造的。其中商式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受周人所迫南迁进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而以大口尊、折肩鬲为代表的B组铜器原产于江汉平原地区，它们是跟随殷遗民南下的江汉平原地方势力带来的。大铜铙起源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湖南的大铜铙应该是本地产品，但铸造年代主要为商末至西周时期，湖南大铜铙的出现无疑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文化传统（其背后是人群）的南来有关。动物造型类铜器如果年代为商代晚期，则肯定不是在湘江流域铸造。本文E组越式铜器为湘江流域本地铸造，是在商末周初殷遗民等南下带来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特色的作品，本组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湘江流域地方青铜文明进入了形成发展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商末周初殷遗民等进入湘江流域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本地有可能铸造上述各类铜器，包括有些明显受周文化影响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发现肯定铸造于中原地区的周式铜器），这并不影响我们以上所进行的类别分析，同时我们也不绝对排除有极少数的铜器为商代晚期通过其它方式流入本地的可能性，同样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对湖南铜器主体性质的判断。前文讲到，湘江流域的商周铜器总的来说是一个整体，炭河里城址的发现证实它们属于以沅水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炭河里文化，那么我们可以对宁乡以外其它地区出土的铜器的来源问题作以下推测：湖南岳阳、华容、平江、浏阳、长沙等地出土的商代铜器应该是商末周初殷遗民等经鄂东南幕阜山南北麓南逃宁乡途中因各种原因遗下的，而宁乡外围地区包括湘江中上游和资水上游地区所见的商周铜器则应该是殷遗民等来到宁乡黄材之后与本地文化交往或被本地文化政治上取代文化上同化的过程中逐渐向外流散形成的。以前笔者曾认为资水上游和广西境内出土的商代铜器可能是中原商王朝与岭南地区商贸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现在看来实

为大谬。笔者观察 1985 年武鸣元龙坡出土的一件索状提梁卣<sup>④</sup>，发现其腹部和盖上的变形龙纹与炭河里城外西周墓葬出土的多件铜器残片上的纹饰<sup>⑤</sup>相近，具有相同的地方特征。另外广西境内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铜器如恭城的蛇纹尊<sup>⑥</sup>、陆川、宾阳等地的兽耳鬲、灌阳铙、贺州罍、忻城、横县等地的钟<sup>⑦</sup>等，这些铜器与湘江流域出土的同类器完全一致，应是湘江流域本地越人在西周、春秋至楚人入驻湘江流域之际与岭南地区交往和迁徙过程中流散过去的。

总而言之，湖南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应该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湘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及江汉地区地方势力等受周人所迫南下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炭河里西周城址的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此，则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历史将要重新认识和改写。我们有理由相信，湘江流域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时期，准确地说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成为标志<sup>⑧</sup>，炭河里、高砂脊等地墓葬出土的大量材料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本地铜器铸造从最初模仿中原铜器到最后形成本地风格的全过程，而商末周初殷遗民等的南迁无疑是湘江流域地方青铜文明形成并发展的主要文化背景和非常关键的契机。当然，湘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滥觞无疑始于商代晚期，岳阳地区商代晚期费家河文化的不少遗址中均曾发现过小件铜器或残片、铜渣、石范等，陶器中可能与冶铜有关的埴锅也不少。可以断言，商代晚期当地铸造武器、工具类小件铜器是毫无问题的。不过，能否铸造容器或否曾经铸造过容器，是青铜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一步，笔者认为湘江流域商代晚期至少还没有大量铸造铜容器，这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当时本地文化在政治和礼制上是否需要的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炭河里西周城址的发现，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群性质诸问题考古研究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它将有可能彻底推翻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宁乡商周铜器群性质问题的公论，从而改写湖南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历史。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检验。不过，本文依据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现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角度对于与湘江流域资料情况类似的南方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铜器的深入研究应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衷心希望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① 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673~6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 向桃初《湖南商代铜器新探》，《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湖南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性质及其与殷墟商文化的关系》，《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岳麓书社，1999年。

关于湖南商周铜器性质诸问题的新思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9期，2001年。

《湖南商周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待刊。

⑤ 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⑥ 向桃初《宁乡黄材西周墓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一期，船山学刊，2004年。

⑦ 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7期待刊。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期。

⑨ 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县温家山商代墓葬发掘简报》，郭胜斌主编《巴陵古文化探索》，华夏出版社，2003年。（另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一文）。

⑩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图版11、40、23、13、29、21，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⑪ 益阳地区博物馆《宁乡黄材出土周初青铜罍》，《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

⑫ 盛定国等《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第2期。

⑬ 2001年6月由4名学生在黄材河中游泳时发现，现藏宁乡县文物管理所。

⑭（美）贝格莱《长江流域的铜器与商代考古》，《奇异的凸目》132页，巴蜀书社，2003年。

⑮ 湖南省博物馆2003年收集，宁乡黄材镇月山铺乡

龙泉村出土，参见湖南省博物馆新编《湖南商周青铜器陈列》13页下图。

⑯ 熊传薪《湖南省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86年。

⑰、⑲ 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⑱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图版17、38，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⑲、⑳ 难波纯子（向桃初译）《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㉑ 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

㉒ 1998年出土，现藏平江县文物管理所，《江汉考古》待刊。

㉓、㉔ 湖南省博物馆等《新邵、浏阳、株洲、资兴出土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3期，岳麓书社，1986年。

㉕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图版122，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㉖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图版15、16，文物出版社，1983年。

㉗ 湖南省博物馆《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辑刊》第1期，岳麓书社，1982年。

㉘ 陈国安《湖南桃江县出土四马方座铜簋》，《考古》1983年第9期。

㉙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图版32、34、33、30，文物出版社，1983年。

㉚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w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 1975.

㉛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1987.

㉜ 林巳奈夫《殷、西周时代的地方型青铜器》，《考古学メモワール1980》，东京，1981年。

㉝ 枣阳市博物馆《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年第6期。

㉞ 余从新《湖北安陆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1期。

㉟ 江西省文管会《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槨墓》，《考古》1965年第6期。

㊱ 荆州地区博物馆《纪江陵岑河庙兴八姑台出土商代铜尊》，《文物》1993年第8期。

③⑦ 彭锦华 《沙市郊区出土的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③⑧ 张一品编 《长江三峡出土文物精粹》乙 001，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年。

③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⑩ 葛介屏 《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④⑪ 安徽省皖西博物馆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铜尊》，《文物》2000年批12期。

④⑫ 南京博物院编 《南京博物院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7年。

④⑬ 何介钧 《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153页，岳麓书社，1996年。

④⑭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墟青铜器》图版四、二六、六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⑯ 《中国青铜器全集》6(西周2)图版170~172，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⑰ 咸宁地区博物馆 《湖北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④⑱ a施劲松 《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考古》1997年第10期。

b.彭适凡 《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④⑲ 高至喜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

《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铜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⑤⑩ 罗泰 《论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乐器》，《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⑤⑪ 彭明瀚 《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⑤⑫ 安徽省博物馆编 《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图10，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⑤⑬ 胡绍仁 《宜春县出土商代铜铙》，《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⑤⑭ 何介钧 《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⑤⑮ 王宏 《论江汉流域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区》，《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二)，江汉考古增刊1991年。

⑤⑯ (美)贝格立 《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干大洋洲墓的时代》，《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⑤⑰ 湖南博物馆 《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1期，岳麓书社，1982年。

⑤⑱ 湖南省博物馆编 《湖南省博物馆》图版19、20，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⑥⑩ 广西自治区文物队等 《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⑥⑪ 向桃初 《宁乡黄材西周墓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一期，彩图四五、四六，船山学刊，2004年。

⑥⑫ 广西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⑥⑬ 梁景津 《广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广西自治区博物馆 《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9期。

⑥⑭ 向桃初 《越式鼎》研究初步》，《古代文明》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上接第87页)

注释：

① 刘建国：《论土墩墓分期》，《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王根富：《苏南土墩墓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②、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3年)。

④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6。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3年)。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6。

⑥、⑪ 镇江市博物馆浮山果园古墓发掘组：《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考古》1979年第2期。

⑥、⑬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6。



**本期**共刊载了向桃初先生的《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刘正先生的《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和陈元甫先生的《土墩墓中一墩多墓年代问题讨论》等三篇论文。

### 一.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曾先后出土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而为世人所瞩目,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诸问题,长期都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法解开的谜团。近年来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宫殿基址和贵族墓葬,这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也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

论文作者向桃初先生多年来一直主持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掘,本文开篇就是在简要介绍炭河里城址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基础上,展开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诸多问题的讨论,论文思维缜密,层次清晰,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作者在论证炭河里城址是西周时期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都邑前提下,进而认定宁乡铜器群同属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出土的一批商代晚期青铜重器,是在商末周初时为周人所逼的殷遗民南下带来的。湘江流域和四川广汉、江西新干不同,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湘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作为标志。等等。作者根据炭河里城址的新发现,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和思考角度,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深入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尚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验证。但是,我认为,作者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铜器群和同一时空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探索,这应是研究青铜器的正确之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

### 二.刘正《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江西余干出土的应监甗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周监国制度的研究,但由于对应国具体地理位置和应监职能理解的差异,至今对《应监甗》铭文的理解至少有五种不同意见。本文在列举诸家不同解释后,即从西周应国封地的地理位置一般是沿袭殷制入手,对西周王朝的监国制度、分封制度和应国与西周中央王朝及邻近诸侯国的关系展开讨论,对众说一一进行分析和驳议,最后作者认为应监的监国所在地和应国的地望是二而非一;应监和应公、应侯是二而非一。因而提出第六种新解,即《应监甗》中“应监作宝尊彝”的应监是西周王朝从应国王室中选出的下派到江西余干地区的出任监国的应氏嫡系子孙,和应公、应侯是两回事。此篇铭文考释,虽文字不长,但搜集资料广泛,考证翔实,提出的新解给人予新的启迪。只是笔者有一点想提出,既然“句监”之句、“荣监”之荣、“艾监”之艾都系指地,那为何“应监”之应不能指地?如“应监”之“应”有可能也系指地的话,而这件“应监甗”又出土在江南的余干而非河南的平顶山地区,那有否可能就如李学勤先生所考证的,在余干地区有一非姬姓的应地,和河南地区的应国仅是同名而已,因为西周时的封国中,同名异地的例子就不乏其例,如“艾”就有两地,据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考证就有齐地的“艾”和吴地的“艾”。故此,此“应监”铭文的最佳正确解释,有待来日新的更多地出土材料的证实。

### 三.陈元甫《土墩墓中一墩多墓年代问题的讨论》: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吴越地区较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之分,而以后者为多,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一墩多墓的年代及其如何分期等问题尚持有不同看法。有少数学者认为同墩内的多座墓葬是在同一或相近时间内埋葬的,因此它们的年代应该是同一或相近的,分期研究应以每个墩为基本的考古单位,而不是墩内的各个墓葬,同墩内出现的叠压打破关系,不具有地层学上的意义。本文作者则同多数学者一样持有不同意见,文中列举较多的江、浙地区考古发掘的墩例,从一墩多墓其封土结构的不同和墩内各墓年代早晚悬殊等几个方面,并以同一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材料为佐证,证明同墩内的多座墓葬是在不同时间形成的,大多数墓葬的年代存在着早晚关系和相隔时间久远,最后作者进而认为,对土墩墓的分期方法,应以墩内的各座墓葬为基本考古单位,而不应是整座土墩,再结合墩内发现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排比和分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通篇论文结构严谨,资料丰富,论证有力。通过一墩多墓中的封土结构及叠压或打破关系,再以各墓中出土遗物陶瓷器为依据,这种对土墩墓进行分期和断代的方法是科学的,也是令人信服的。